

李夢陽的文學觀念中的地域差異

王昌偉

摘要

後人多為明中葉提倡文學復古運動的文人集團冠上「前七子」的名號。七子當中除了徐禎卿是南方人，其餘都是北方人。有學者因此認為前七子提倡文學復古，實含有為北方文學爭勝的意味。本文通過對此一集團的領袖人物李夢陽的考察，旨在說明地域差異確實是我們理解明代文化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不過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流與競爭的實情卻相當複雜，因此，當我們從地域研究的角度分析明代的文學現象時，不宜陷入地理決定論的誤區而簡單地依據歷史人物的北方人或南方人的身分下定論。

關鍵詞：地域差異、南北問題、李夢陽、前七子、文學復古運動

2018/3/1 收稿，2018/4/12 審查通過，2018/4/25 修訂稿收件。

* 本文蒙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陳英傑教授邀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修改意見，以及研究助理周永蕙小姐和學報編輯助理的辛勤勞作，一併致謝。

** 王昌偉現職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DOI:10.30407/BDCL.201806_(29).0002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Li Mengyang's Literary Thought

Ong Chang-woei

Abstract

Today we tend to apply the label of “Former Seven Masters” to the literati community that initiated the literary archaist movement in the mid-Ming period. Members of the “Former Seven Masters” were all northerners except for Xu Zhenqing. Some scholars have thus argued that when the Former Seven Masters promoted literary archaism, they were in fact trying to raise the status of northern literature at the expense of its southern counterpart. By zooming in on the leader of this commun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how that regional disparity is indeed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interactions and competitions between the different regions were complex and deserve closer attention. When we adopt the method of regional analysis for studying Ming literature, we shoul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trap of geographic determinism and arriving at a conclusion based solely on the regional identitie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whom we study.

Keywords: Regional disparities, the problem of north and south, Li Mengyang, Former Seven Masters, Literary archa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一、前言

有明一代，甚少有論文章者不尚古或提倡復古，但真正能成就一場旗幟分明，影響深遠的文學運動的，則首推李夢陽（1473-1530）和何景明（1483-1521）等人。後人多以「前七子」為領導這一場運動的代表人物。七子當中除了徐禎卿是南方人，其餘都是北方人。¹有學者因此認為前七子提倡文學復古，實含有為北方文學爭勝的意味，也是政壇上南北之爭在文學場域的反映，²亦有學者認為，「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是在西北文人主導下興起的，葆有北地高上氣力之風氣」。此一文學集團「反對『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遂有北方文學的興起」。³更有學者把七子成員的籍貫和其詩風與詩學聯繫起來，得出「明弘治、正德年間的關隴詩壇，因有李夢陽、康海、王九思等前七子成員，而成為復古運動的一大重鎮，並且使得浸染了北地超邁雄豪的詩風隨著關隴作家到各地任職，而成明中期詩壇一時之風氣，亦成為在李夢陽倡揚下，復古運動所追求的風格之一」這樣直接把復古思潮和作家的地域身分、文學主張與創作等同起來的結論。⁴

中國歷史上因為地域差異而引起的南北文化的競爭，至少可追溯到《孟子》中所謂「南蠻隸舌之人」的說法，⁵而我們今天所熟知的關於南北文化差異的既定印象——南柔北剛、南巧北拙、南秀北壯、南浮北厚等等——則是在南北朝時期逐漸形成的。⁶宋代以後，因為科舉取士的緣故，有關南北差異的論述常與解額的爭奪掛鉤，治平元年（1064）歐陽修（1007-1072）與司馬光（1019-1086）的爭論即是一例。⁷明代圍繞著「南北榜」、「南北卷」等與科舉有關的大案和政策而引發的不同地域之間的競爭，逐漸醞釀成政

¹ 李、何以外，前七子還包括邊貢（1476-1532）、王廷相（1474-1544）、康海（1475-1540）、王九思（1468-1551）和徐禎卿（1479-1511）。

² 郭皓政：〈明代政壇南北之爭與前七子的崛起〉，《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64卷第3期（2011年5月），頁84-90。

³ 楊遇青：《明嘉靖時期詩文思想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頁123-124。

⁴ 劉坡：《李夢陽與明代詩壇》（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54-155。

⁵ 《孟子·滕文公上》，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臺北：學海出版社，1989年），頁272。

⁶ 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pp. 310-366.

⁷ 劉海峰：〈科舉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爭〉，《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總第42輯（1997年3月），頁153-167。

治上天順、成化年間的南黨和北黨之爭。⁸南北之間的競爭在明代異常突出，甚至有學者因此斷定明朝的一切政爭都是由南北士大夫之間的分歧導致的。⁹

地域差異確實是我們理解明代政治與文化發展的一條重要線索。在文學發展史方面，廖可斌先生提醒我們，有明一代，「每股文學潮流都帶有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明顯的地域色彩。不對各種地域文化的特徵和作用進行詳細考察，我們就不能清楚了解每股文學潮流興起的原因和過程，也不能準確把握其內部構成和複雜特徵」。¹⁰

不過不同地域之間的交流與競爭的實情卻相當複雜，如天順、成化間的南北黨爭，實際的情況是南黨之中有北人而北黨之間也有南人，「南黨」、「北黨」這類的標籤更多是介入政治紛爭的士大夫為了打擊對手才為對方貼上去的。¹¹另外，諸如「南北榜」和「南北卷」之類帶有地域競爭色彩的事件，卻是不同的政治集團試圖控制科舉與薦舉這兩種不同的取才途徑爭權奪利的現象的折射。¹²因此，當我們從地域研究的角度分析明代的歷史現象時，不宜簡單地依據歷史人物的北方人或南方人的身分下定論。在文學的場域也是如此。本文以李夢陽為例，旨在說明明代文化中南北問題的複雜性及其對文學發展的影響，並檢討當前學界習慣性地根據李夢陽地域身分下定論的地理決定論的研究方法。

二、李夢陽對北人的批評

晚明學者胡應麟（1551-1602）在概括 16 世紀的文壇時有如下觀察：

當弘、正時，李、何、王號海內三才。如崔仲鳧、康德涵、王子衡、薛君采、高子業、邊廷實、孫太初，皆北人也。南中惟昌穀、繼之、華玉、升之、士選輩。不能得三之一。嘉隆則惟

⁸ 陳綸緒：〈記明天順成化間大臣南北之爭〉，收於錢穆等著：《明代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8年），頁249-278。

⁹ 鄭克晟：《明代政爭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

¹⁰ 廖可斌：〈文學思潮史的寫法：以明代文學思潮史為例〉，《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3卷第5期（2016年9月），頁43-54。

¹¹ 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in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03.

¹² 王昌偉：〈明初南北之爭的癥結〉，《明清史集刊》第9卷（2007年9月），頁27-48。

李于鱗、謝茂秦、張助父北人，而南自王、汪外，吳、徐、宗、梁不下十數家，亦再倍於北矣。¹³

胡應麟此處羅列的都是復古運動的同道，從參與者的身分來說，人數比例呈現了從弘、正之際的北多南少到嘉、隆之際南多北少的轉向。不過這份名單卻也說明了「前七子」、「後七子」這樣的標籤對我們理解明代的復古運動意義不大，因為參與到 16 世紀這兩波文學思潮中的文人，人數要遠遠多於七個人。更為重要的是，弘、正時期復古陣營內雖然存在北人、南人數目不平均的事實，但卻遠非「前七子」這一由後人總結出來的概念所表現的那樣懸殊。如果南方人在第一波的復古運動中也有相當數量，那所謂復古運動是北方文人擡高北方文學的手段觀點，就相當值得商榷。

更何況，何謂「北方文學」？是否北人就一定會設法發揚北方文化？其實，在李夢陽的著作中，不但未見推崇北方文化的例子，反而透露了其對北人的批評：

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聘吳楚之間，歛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¹⁴

身為南方人的朱應登（1477-1526）是李夢陽提倡古文詞的同道。當時在南方還有顧璘（1476-1545）、劉麟（1475-1561）和徐禎卿等人相呼應。作為「北人」的執政者不喜朱應登，表面看來似乎是對南方文化的一種壓制，但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李夢陽年表的作者朱安湜（?-?）的追記，「執政者」批評的對象不是朱應登，而是李夢陽本人：

¹³ [明]胡應麟：《詩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頁363。

¹⁴ [明]李夢陽：〈凌谿先生墓志銘〉，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30年刊本，1602年），卷47，頁1下-4上。

十一年戊午，公二十七歲，服闋如京師。時執政大臣，北人也，弗善公。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於是授公戶部山東司主事。¹⁵

我們今天已無從知道真相究竟如何，但如果受到執政大臣指責的是同為北人的李夢陽的話，那這一事件所反映的南北衝突就顯得更為錯綜複雜。不過我們起碼可以確定，李夢陽並沒有袒護北方文化或者試圖為北方文學張目的意圖。

李夢陽在另外一處點明所謂的「執政者」指的首輔大臣劉健（1433-1526）：

「小子何莫學夫詩」，孔子非不貴詩。「言之不文，行而弗遠」，孔子非不貴文。乃後世謂文詩為末技，何歟？豈今之文非古之文，今之詩非古之詩歟？閣老劉聞人學此，則大罵曰：「就作到李杜，只是箇酒徒。」李杜果酒徒歟？抑李杜之上更無詩歟？諺曰「因噎廢食」，劉之謂哉！¹⁶

這段議論收錄在李夢陽晚年所著之《空同子》中。根據朱安流의說法，李夢陽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閔聖遠言湮，異端橫起，理學亡傳，於是著《空同子》八篇」。¹⁷因此載於此書的意見都是李夢陽為端正學術而發的。他首先指出詩文非末技，然後以今之詩文與古之詩文做對比。結合李夢陽為朱應登所作的墓誌銘考察，他並沒有把古文詞視為北方專屬的文學體例。相反的，在他看來，北方的士人文化整體而言缺乏文采和對詩歌的尊重。身為北方人，劉健學術上傾向於經學而鄙視需要文采的詩歌，以詩文聞名的朱應登就因此吃了虧。從一段描述中可看出，儘管李夢陽是北方人，但他對北方重經學輕文學的學術環境是頗不以為然的。

朱應登在仕途上不僅僅受到北人的壓制，他還面對「柄文者」的歧視。一般認為「柄文者」指的可能是李東陽（1441-1516）。¹⁸後人常因李東陽祖籍湖南茶陵而把成化、弘治年間以李東陽為核心的文學圈子稱為茶陵派，從晚明以來，就有不少論者以李東陽為楚地文化傳統的代表之一，¹⁹今人更

¹⁵ [明]朱安流：〈李空同先生年表〉，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附錄1，頁3上。

¹⁶ [明]李夢陽：〈論學下〉，收於同上註，卷66，頁7上。

¹⁷ [明]朱安流：〈李空同先生年表〉，附錄1，頁13上。

¹⁸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65。

¹⁹ 有關萬曆時期楚地文人如何建構楚地文化傳統，見謝旻琪：〈萬曆中後期楚地文人詩學中

加以延伸，或以茶陵派成員多為吳中人而認為其所呈現的是一種吳中的學術思維，而「弘治末年前七子反對茶陵派，實際上就是北方文士對南方文士的反擊，所謂復古，即是恢復到北方文士的文化正統地位」。²⁰

不過以地域文化屬性定義茶陵派必然會碰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此一文學集團的領袖李東陽雖然祖籍茶陵，但卻出生於北京，大半生也在北京度過。²¹因此無論是「茶陵」、「楚地」、「吳中」甚至是「南方」，其實都難以用來界定此一集團的文化性格。至於李夢陽批評柄文者「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也很容易讓人產生聯想，認為這是李夢陽在對南方，尤其是以六朝詩歌為代表金陵文學傳統表示不滿，因為長期以來金陵詩風都被視為是浮艷靡麗的。²²不過我們不能因為人們習慣上會把雕浮靡麗之詞和金陵聯繫起來，就簡單以為李夢陽也作如是想，同時還站在北方文化的立場進行批評。我們必須摒棄這種直接把地域差異與詩風畫上等號的觀點，才能夠正確把握李夢陽批評「柄文者」的真義。

三、李夢陽對六朝以來南方詩歌的評價及其反映的地域觀

李夢陽評六朝詩，同時兼顧時間、空間與藝術體裁各種元素：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也。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曩予會升之河西關，有傾蓋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知其為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臥，歷代寶之，永以為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為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

的楚地思維》，《東亞漢學研究》第2卷（2012年4月），頁37-47。

²⁰ 孔健：《士與國家：明代弘治、正德年間文學復古運動研究》（香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2013年），頁39。

²¹ Fang Chaoying, "Li Tung-yang,"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877-881.

²² 張燕波：〈論明代金陵六朝派的發端與發展〉，《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第45卷第3期（2008年5月），頁133-141。

尚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蘄。」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不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不能越是以往，明矣。²³

此篇是李夢陽與友人為即將歸朝報政的朱應登餞行時而作的社交詩所寫的引子。與會者除了李夢陽和朱應登，還有劉麟和邊貢，以及一名以園主身分列席的武官。文中李夢陽除了追述他和朱應登結交的過程，也提及後者的書法與詩歌經歷了從習唐到習六朝的變化。接下來李夢陽筆鋒一轉，從文氣和時運的關係的角度評論六朝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李夢陽並沒有一味否定六朝。雖然他對六朝詩歌與書法的孱弱、浮靡、媚俗等等有所批評，卻也承認鮑照（414-466）、謝靈運（385-433）和王羲之（303-361）等人的影響深遠，對詩歌和書法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建國以後，文士推崇六朝文風，在南都（金陵）更是如此。在李夢陽看來，既然南都是六朝故地，當地文士推崇六朝文是理所當然的，但身為齊人的邊貢（庭實）也如此，就難免需要一番解釋。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段議論，就會發現李夢陽固然從地域性出發論述文化的特色，但他的著眼點卻不在於通過貶低金陵和南方文化來突出北方文化的優越性。相反的，李夢陽旨在通過邊貢的例子說明如果想要達到騷雅籀頡的高度，即使是北方人也必須認真看待六朝的詩歌和書法，因為其中自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李夢陽對南方文學的評論，還出現在他和徐禎卿論文章的書信中：

僕西鄙人也，無所知識，願獨喜歌吟，第常以不得侍善歌吟憂。間問吳下人，吳下人皆曰：「吾郡徐生者，少而善歌吟，而有異才。」蓋心竊鄉往久之，聞足下來舉進士，愈益喜，計得一朝侍也。前過陸子淵，子淵出足下文示僕，讀未竟，撫卷歎曰：「佳哉！鏗鏗乎古之遺聲耶！」²⁴

²³ [明]李夢陽：〈章園餞會詩引〉，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56，頁11下-13上。

²⁴ [明]李夢陽：〈與徐氏論文書〉，收於同上註，卷62，頁3上-5上。

李夢陽以「西鄙人」自居，²⁵突出吳中人善歌吟的優勢，字裡行間透露出艷羨之情。他在閱覽了徐禎卿的文章之後更感欽佩，認為其中承載了古之遺聲。這樣的論述以「西」對「吳中」，似乎是對吳中先進文化傳統的推崇。但當徐禎卿表示要依唐代皮日休（834-883?）和陸龜蒙（?-881）之例和李夢陽唱和，李夢陽反而猶豫了：

方伏謁足下，會足下不以僕鄙薄，幸使使臨教曰：「竊欲自附於下，執事即如日休、龜蒙輩，走之願也。」僕聞之，悚息不敢出一語應，意者，足下戲邪？居無何，使者三反，於是乃敢佈愚悃昌穀足下……昔者舜作〈股肱〉、〈卿雲〉之歌，即其臣皋陶、岳牧等賡和歌，當是時一歌一和，足下以為奚為者耶？其後召康公從成王游卷阿之上，因王作歌，作歌以奉王即王，戚戚入也。足下亦觀諸風乎？瀏瀏焉，其被草若木也。颯颯溶溶乎，草木之入風也。故其聲鞀磬轟砰，徐疾形焉，小大生焉。且孔子何人也，與人善歌矣，必返而後和，何則？未入耳。今足下忘鶴鳴之訓，舍虞、周賡和之義弗之式，違孔子反和之旨，而自附於皮、陸數子，又強其所弗入，僕竊謂足下過矣！夫詩，宣志而道和者也，故貴宛不貴嶮，貴質不貴靡，貴情不貴繁，貴融洽不貴工巧。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故音也者，愚志之大防，莊誡、簡侈、浮乎之界分也。至元、白、韓、孟、皮、陸之徒為詩，始連聯鬥押，累累數千百言不相下，此何異於入市攫金，登場角戲也？²⁶

李夢陽首先列舉上古至孔子的例子說明詩人之間的唱和有比皮、陸更值得仿效的傳統。孔子以前，主要是君主先唱然後由臣工和，因此基本上是一種政治行為。「孔子反和」的典故出自《論語·述而》：「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²⁷朱熹解釋這句話強調聖人對「善」的態度：

²⁵ 李夢陽出生於陝西慶陽（今屬甘肅省）。雖然他成年後大部分不為官的時間是在河南度過，但他卻是在陝西考中鄉試，因此西北對他而言一直都非常重要。

²⁶ [明]李夢陽：〈與徐氏論文書〉，卷62，頁3上-5上。

²⁷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102。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²⁸

跟前面古聖王的例子比較，孔子的唱和已不純粹是一種政治行為。在朱熹的詮釋下，「反和」之舉蘊含了聖人對至善之追求，是一種道德行為。李夢陽認為詩歌是「宣志而道和者」，通過吟唱，聽者能「聞其樂而知其德」，讓人明白「愚志之大防，莊誥、簡侈、浮浮之界分」。這些意見顯示李夢陽視詩歌和唱和為一種教化手段，重視的是詩歌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教功能。至於他對孔子「必反而後和」的解釋則從「入」這個概念入手，強調的是歌者和和者融洽無間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實蘊含著天地間造化的奧秘，因此有所謂風入草木之說。李夢陽論詩，常從天地自然之氣的運轉入手，進而跟萬物、風俗與政事聯繫起來：

夫天下之氣，必有為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颺颺乎，莫知所從，颺颺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瘠惡，湔澆而培淳，廸純以劇其駁，而後化可行也。²⁹

基於這種對詩歌的理解，李夢陽對徐禎卿希望能效仿皮、陸與自己唱和十分不以為然，因為那樣的酬唱完全是以一種遊戲的態度對待詩歌，一味追求「連聯鬥押」，無視詩歌的道德與政治使命。雖然李夢陽此處批評的對象除了皮、陸，還有元稹（779-831）、白居易（772-846）、韓愈（768-824）和孟郊（751-814）等中晚唐詩人，顯示他對詩壇普遍存在的以詩歌為文字

²⁸ 《論語·述而》，見〔宋〕朱熹：《四書章句集註》，頁102。

²⁹ 〔明〕李夢陽：〈觀風亭記〉，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49，頁7上-9上。

遊戲的態度不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吳中的文人圈子中，皮、陸的地位非常高，因為二人深厚的交情是在蘇州奠定的。「二人詩中所描寫內容多為在吳中的閑適生活。寫有大量與閑居、垂釣、酒具、茶具、漁具等有關的詩歌。因他們隱在吳中，又於閑適、高隱等精神上可以與吳中文人溝通，所以皮陸二人在吳中享有盛譽，為吳中眾多文人效仿與歌頌的對象」，³⁰徐禎卿提及皮、陸，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卻能被理解為對吳中傳統的認同，因此李夢陽從「西鄙人」的角度出發，同時強調徐禎卿吳中人的身分，似乎是在引導讀者從地域的層面兩種文學立場的差異。

不過顯而易見，李夢陽對吳中文化的批評不是簡單地揚北抑南。首先，李夢陽比較的是「西」和「吳下」，即使他想要強調的是「西北」和「東南」的差別，那也不是泛泛的北與南。另外，雖然李夢陽對吳中文人對待詩歌的遊戲態度不滿，但卻也肯定吳中文人的善歌吟，是他這個「西鄙人」所不及的。吳中的詩歌傳統固然有可以令人詬病之處，但其對音樂性的追求，卻是值得學詩之人共同學習的。因此，要了解李夢陽對地域差異與詩歌的關係，就必須從他對詩歌音樂性的思考入手。

四、李夢陽論詩歌的音樂性與地域差異

李夢陽論文章注重「法」是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但何謂「法」？為什麼作文必須依「法」而行？守「法」難道不會變成墨守成規？李夢陽在和摯友何景明論辯曾如此為自己辯解：

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而尺尺寸寸之耳……。」
古之工，如倅、如班，堂非不殊，戶非不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仆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仆竊古之意，盜古之形，剪裁古辭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圓倅之圓，倅，方班之方。而倅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³¹

³⁰ 崔秀霞：〈徐禎卿、李夢陽論辯考析〉，《時代文學》總第 155 期（2009 年 5 月），頁 206-207。

³¹ 〔明〕李夢陽：〈駁何氏論文書〉，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 62，頁 6 下-10 上。

作文必有法，正如蓋房子必須有方圓。有了方圓以後，並不表示房子的形狀就必定會完全一樣。同樣的，作文即使必須「尺寸古法」，但只要能「以我之情，述今之事」，那就不會有泥古的問題。但這究竟仍然是從大原則出發，具體操作的時候應當如何？李夢陽在論詩時有如下意見：

夫詩有七難：格古、調逸、氣舒、句渾、音圓、思沖、情以發之。七者備而後詩昌也。³²

這七者從詞句到音調情思，包含了作詩的方方面面，但正如簡錦松先生所言，其中最重要的，當屬「音度」。³³ 詩歌的音樂性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詩歌唯有通過音調才能表現出「真」：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罟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願往往為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採，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調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即其俗成聲。今之俗既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辯也。」³⁴

李夢陽借王叔武之口提出「真詩乃在民間」的口號，並以此批評當代的文人學子詩。³⁵ 真正的詩歌應該是天地自然之音，老百姓在日常作息中的謳歌就是詩歌，如今的文人學子卻拋卻詩歌的音樂性，一味追求文字的精美，導致真詩的式微，因此想要恢復真詩，文人學子就得放下身段，往民間汲取養分。

³² [明]李夢陽：〈潛虬山人記〉，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48，頁9下-11上。

³³ 簡錦松：《明代文學批評研究》，頁229-232。簡錦松：《李何詩論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0年），頁152-166。

³⁴ [明]李夢陽：〈詩集自序〉，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首，頁1上-6下。

³⁵ 王叔武即王崇文（1468-1520），與李夢陽是同科（癸丑年（1493））進士。

問題是，在北方，由於經歷了金元時期的異族統治，民歌帶有胡音，是否還能算「真」？李夢陽再次借王叔武之口，指出民歌的音樂性會隨著不同地區風俗的不同而有所差異，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因為音樂的產生唯有源自於「情」才能算是真，而情又會因人而異，因地而異，那真詩自然就會因為具體社會環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問題是，如果音樂帶有地域的特殊性，那所謂「真」詩，是否就只能多元獨立發展的狀態？換言之，在承認真詩必然會因人因地而存在差異的前提下，是否還應該追求共通性？李夢陽從《論語》所謂「詩可以觀」入手，說明「可以觀」的基礎正在於「同」：

「詩可以觀」，豈不信哉！夫天下百慮而一致，故人不必同，同于心；言不必同，同于情。故心者，所為權者也；情者，所為言者也。是故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行藏顯晦，天之畀也。是故其為言也，直宛區，憂樂殊。同境而異途，均感而各應之矣。至其情則無不同也。何也？出諸心者一也，故曰：「詩可以觀。」³⁶

這篇文章是為一名趙姓武官所辦的宴會上唱和的詩作而寫的。會上眾人的身分地位並不平均，因此才有「科有文武，位有崇卑，時有鈍利，運有通塞。後先長少，人之序也」之說。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眾人之情因都由心所產生，因此都是「同」的。值得注意的是，李夢陽所謂的「同」是從「均感而各應之」立論的，而非否認各人詩歌中所表露的情感存在區別。他在另外一處把這個意思表達得更為清楚：

情者，動乎遇者也……故遇者物也，物者情也。情動則會心，會則契神，契者音，所謂隨寓而發者也……故天下無不根之萌，君子無不根之情。憂樂潛之中而後感觸應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遇。³⁷

人心同有憂樂之根，在接觸外物之時就會產生相應的情感，而詩人則會依據當下的經驗，通過音調把文字鋪成詩歌，故曰「遇者因乎情，詩者形乎

³⁶ [明]李夢陽：〈敘九日宴集〉，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59，頁12下-13上。

³⁷ [明]李夢陽：〈梅月先生詩序〉，收於同上註，卷51，頁6上-7上。

遇」，但因遇有不同，發出的情感自然有所不同。結合上引〈敘九日宴集〉所論，雖然與會眾人所作之詩，有直有宛，有憂有樂，但都是有感而發。通過詩歌可以察人觀世，正因為真詩是人們真實情感的反映，而情感則源於人心。詩歌的這一特質，能超越地域的差異，達到情感上的共鳴：

夫詩，發之情乎？聲氣其區乎？正變者時乎？夫詩言志，志有通塞，則悲歡以之，二者小大之共由也。至其為聲也，則剛柔異而抑揚殊，何也？氣使之也。是故秦魏不貫調，齊衛各擅節，其區異也。唐之詩最李杜，李杜者，方以北人也，而張生者滇產也，其為詩杜何也？夫張生者，志非通也。其春園之亂曰：「舊醅野客，新蕨盤飧。」³⁸茲其情，又何懼也？夫鴈均也，聲啾啾而秋，雝雝而春，非時使之然邪？故聲時則易，情時則遷。常則正，遷則變。正則典，變則激。典則和，激則憤。故正之世，二南鏘於房中，雅頌鏗於廟庭。而其變也，風刺憂懼之音作，而來儀率舞之奏亡矣。於是考槃載吟，伐檀有詠，北風其涼之篇興，而十畝之間之歌倡矣。斯所謂恬塞棄通，以懼祛悲者也。夫大人尚兼，君子恥獨，故〈卷阿〉之章曰：「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凰鳴矣，於彼朝陽。」言士貴及時樹勛也。³⁹

在這篇為雲南布衣詩人張含（1479-1565）的詩集所寫的序中，李夢陽試圖說明身為雲南人的張含作詩為何要效法身為北方人的杜甫（712-770）。但細讀全文，李夢陽的重點並不在於突出北方的優越性，而在於說明地域差異雖然有其必然性（因為氣的運轉的關係，使得不同地域的詩歌的聲調呈現剛柔抑揚的差異），但從詩人得志與否所表現出來的情感卻是可以相通的。張含之不得志一如杜甫，故其為詩能化用杜甫詩句並感應到杜甫的情感。

這篇序文另外一層重要的意思就是指出詩人所處的時代與詩歌的關係。無論是杜詩還是張含的作品，都屬於「風刺憂懼之音」，反映的是身處

³⁸ 這是化用杜甫名篇〈客至〉「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句而成。見〔清〕王堯衢著，詹福瑞、單小青點校：《唐詩合解箋注》（石家莊：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30。

³⁹ 〔明〕李夢陽：〈張生詩序〉，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51，頁5下-6下。

一個偏離了理想狀態的社會的情感。因為時不我予，志不得申，詩人只好通過吟詠排遣傷感的情緒。因為時代的關係，這類「變」聲的出現固然無可厚非，但身為「大人」、「君子」的士子卻還是應該及時建立功名，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張含有一次以「優游」名其堂，向李夢陽索記文，後者趁此機會規勸他，指出這類隱逸心態所可能造成的政治上的後果：

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蒲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君無與官。⁴⁰

入仕是士人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他們肩負著協助君王經世濟民的政治使命。同樣的，李夢陽論詩雖然重視差異性，但他的終極目標始終是確立詩歌在政治層面促進和諧的功能。⁴¹換言之，詩歌的最高境界即在於為這萬殊的世界創造統一的條件：

夫天下有必分之勢，而無能已之情。蓬飛梗流，忽聚倏散，斯其勢，能必其不分哉？孔子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夫既東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悵離思合者乎？於是筵於庭，祖於道，觴于郊，嬉于園，不有繾綣踟躕者乎？斯之謂情也。情動則言形，比之音而詩生矣……故必分者勢也，不已者情也，發之者言，成言者詩也，言靡忘規者義也，反之後和者，禮也。故禮義者，所以制情而全交，合分而一勢者也。⁴²

和李夢陽為同榜進士的夏從壽（?-?）卸下鄖陽巡撫一職時，當地官員和士紳為其餞行，賦詩送別。此篇以這類場合的聚散為主題引申出詩歌「合」與「一」的功能。雖然與會者都是來自各地，難以久駐一處的東西南北之人，但眾人之間繾綣踟躕的情感轉化為文字並通過音樂表達出來以後，則形成交流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之上，按照作詩的規範（言靡忘規）和唱和

⁴⁰ [明]李夢陽：〈優游堂記〉，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49，頁3下-4上。

⁴¹ 侯雅文：《李夢陽的詩學與同文化思想》（臺北：大安出版社，2009年），頁90-100。

⁴² [明]李夢陽：〈題東莊餞詩後〉，收於[明]李夢陽：《空同先生集》，卷59，頁16上-下。

的行為（反之後和）建立禮義的準則掌握情感的交流，這樣即使分離是必然之勢，合一的理想也是能夠達致的。

五、明代文人對李夢陽的評價中所展現的地域意識

李夢陽雖然從來不以北方文化的代言人自居，但在南北差異意識濃厚的明代，人們習慣把李夢陽視為北方學術的代表。例如吳中士林領袖祝允明（1460-1526）對徐禎卿赴北方學習古文詞一事曾寫下兩句詩：

遑遑訪魏漢，北學中離群。⁴³

此詩雖是為懷念徐禎卿而作，但「遑遑」、「離群」都吐露了祝允明對徐氏「北學」的不以為然。吳中文人對家鄉的強烈情感是許多學者都注意到的現象，祝允明的這首詩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⁴⁴後來當錢謙益（1582-1664）編《列朝詩集》的時候，他的吳中本位立場亦十分明顯。⁴⁵其中他對前輩黃省曾（1496-1546）的嚴厲批評更是延續祝允明對「北學」的看法，並直指李夢陽：

省曾，字勉之，吳縣人……李獻吉以詩雄於河雒，則又北面稱弟子，再拜奉書，而受學焉……吳中前輩，沿習元末國初風尚，枕藉詩書，以噉名干謁為恥。獻吉唱為古學，吳人厭其剽襲，頗相訾訾。勉之傾心北學，游光揚聲，袖中每攜諸公書尺，出以誇示坐客，作臨終自傳，歷數其生平貴遊，識者哂之。⁴⁶

錢謙益借批評黃省曾的人格抨擊李夢陽的古學，特別強調吳中文人對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北學的不滿，地域意識表露無遺。後來黃宗羲（1610-1695）為黃省曾「平反」，指出後者的詩文並未受李夢陽影響：

⁴³ [明]祝允明：〈夢唐寅徐禎卿（按：亦有張靈）〉，收於[明]祝允明：《枝山文集》（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13年元和祝氏刻本，1874年），卷4，頁1上。

⁴⁴ Chang Kang-I Sun,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ed.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6-41.

⁴⁵ 簡錦松：〈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文學新鑰》第2期（2004年7月），頁127-158。

⁴⁶ [明]錢謙益：〈黃舉人省曾傳〉，收於[明]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丙集，頁320-321。

五嶽（按：黃省曾號五嶽山人）之文學六朝，然意思悠長，不僅以堆沓為工，則是陽明問道之力。牧齋因其北學，訾毀過甚，其實五嶽未嘗染空同一毫習氣也。⁴⁷

黃宗羲認為黃省曾之所以能學六朝又不重蹈六朝之失，主要是因其也同時向王陽明（1472-1529）問道，而錢謙益對他「北學」的批評也不公允。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黃宗羲不認同錢謙益對黃省曾的評價，但他和錢謙益一樣，把黃省曾向李夢陽問學定義為「北學」，也對李夢陽的文章不以為然。

被李夢陽的文學主張吸引過去的吳中人除了徐禎卿和黃省曾，還有名列「後七子」的王世貞（1526-1590）。同列後七子的李攀龍（1514-1570）曾鼓勵他擺脫江南文化的限制，去追尋李夢陽的足迹：

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即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埃諸王者，故五百年一名世出，猶為多也。吳越渺兵火，詩書藏於闐闐，即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竽濫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為難耳。故能為獻吉輩者，乃能不為獻吉輩者乎？⁴⁸

李攀龍首先以齊魯對吳越突出南北文化發展的不均衡，但他筆鋒一轉，卻開始批評吳越的文學傳統，並鼓勵王世貞「超乘而上」，以李夢陽為學習目標。在回信中，王世貞感謝李攀龍對他的期許，也對吳中文人批評李夢陽表示不滿。⁴⁹李攀龍與王世貞一北一南，都站在維護李夢陽的立場批評吳中文化，王世貞甚至還是吳中人，他在這封信中的態度和後來的錢謙益就很不一樣。

錢謙益和黃宗羲都是南方人，他們對李夢陽的批評似乎有刻意貶低北方文化的意味，而同樣身為南方人的陳子龍（1608-1647）在論及李夢陽卻表現出崇北抑南的傾向：

⁴⁷ [清]黃宗羲：《明文授讀》，收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00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卷7，頁369。這段議論是針對黃省曾的〈難柳宗元封建論〉而發的。

⁴⁸ [明]李攀龍：〈送王元美序〉，收於[明]李攀龍：《滄溟先生集》（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甲戌徐中行刊本，1573年），卷15，頁18上-下。

⁴⁹ [明]王世貞：〈與李于鱗〉，收於[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卷117，頁2上-下。

仙才寂寞兩悠悠，文苑荒涼盡古丘。
漢體昔年稱北地，楚風今日滿南州。
可成雅樂張瑤海？且剩微辭戲玉樓。
頗厭人間枯槁句，裁雲剪月畫三秋。⁵⁰

在這首寫給方以智（1611-1671）的七言律詩中，「北地」指的是李夢陽的家鄉慶陽府，世人因此多以北地稱李夢陽。但當陳子龍以「北地」和「南州」對應，很明顯是從南北差異的角度把李夢陽的古文詞和源自楚地（湖廣）的公安派與竟陵派的文學思潮作比較。在楚風遍布南方的今日，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北方古文詞傳統被邊緣化，結果雅樂不得而聞，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詩句在流傳著。陳子龍在文學上推崇李夢陽等人的復古主張，強調要從文章形式上進行改革，帶動了明代第三波，也是最後一波的古文詞運動。⁵¹他通過這首詩把問題以區域差異的方式呈現出來，為不同的文學思潮貼上南北的標籤，但他主要針對的是楚風，因此其立場不是泛泛的南北對立所能夠概括的。

以上的例子可看出，明代文人常從地域差異的視角出發評價李夢陽及其復古主張，我們今天對李夢陽的認知常受其左右，並因此根據李夢陽的北人身分認定他提倡古文詞必定是為了擡高北方文學的地位。但從以上的這些例子可看出，明人對復古思潮評價的高低不全取決於評論者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這一方面顯示南北問題的複雜性，我們不宜簡單地根據研究對象的南人或北人身分就斷定他們對南北文化所採取的態度。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真看待地域差異對明代文學的進程所帶來的影響，因為那是明代文人思考不同文學流派之間交流與競爭最常使用的分析角度之一。

六、結論

綜上所述，李夢陽雖然身為北方人，但他對北方文化的觀察和評論卻不完全是正面的，同樣的，他對六朝以來南方詩歌傳統的看法也不完全是負面的。有些學者根據李夢陽北方人的身分推論他提倡復古是為了擡高北

⁵⁰ [明]陳子龍：〈遇桐城方密之於湖上，歸復相訪，贈之以詩〉，收於[明]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15。

⁵¹ 劉勇剛：《雲間派文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1-55。

方文學的地位，這一種地理決定論的研究方法把明代複雜的南北問題簡單化，對我們理解李夢陽的詩學如何處理地域差異這一現實問題幫助不大。

不過，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放棄利用地域差異這條線索考察李夢陽的文學思想和明代文學的演進。恰恰相反，從李夢陽對劉健的批評，到他對邊貢學六朝詩和張含學杜詩的觀察，都說明他對這個問題十分敏感。他一方面肯定差異（包括地域差異）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如認為在南都盛行的六朝詩自有其不可抹殺的價值，另一方面則致力於建立一個可讓身分背景千差萬別的人們在禮義的規範下實現情感交流的詩學體系，而這個體系並不純粹是以北方的文學傳統為基礎的。北方的詩歌傳統如杜詩，甚至包括金元時期帶有「胡音」的民歌固然值得南方人學習，南方的鮑謝也同樣值得北方人學習。李夢陽心目中的「真詩」因為音調的關係，自然會帶有地域性的特色，但卻也擁有超越地域差異，能讓來自不同地方的人產生共鳴和互相交流的特點。李夢陽論詩一再強調音調與情感的交融無間是真詩最根本的元素，正是為了說明詩歌在建立和諧社會方面的政治功能。因此，他對劉健全盤否定詩歌的價值十分不滿，也對吳中文人把作詩視為遊戲的態度加以批評。

儘管李夢陽的理想是建立一套可以溝通南北的詩學體系，但從一開始，他的文學主張就被貼上「北學」的標籤。這深刻左右了人們對明代文學復古思潮的理解，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我們要正確認識李夢陽的文學主張和明人對他的評價，就必須仔細審視這些地域性標籤背後的各種意涵，才能避免陷入地理決定論的誤區。

【責任編校：黃曉彤、郭美吟】

徵引文獻

專著

- 〔宋〕朱熹 Zhu Xi：《四書章句集註》*Sishu zhangju jizhu*，臺北 Taipei：學海出版社 Xuehai chubanshe，1989 年。
- 〔明〕王世貞 Wang Shizhen：《弇州山人四部稿》*Yanzhou shanren sibu gao*，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間世經堂刊本。
- 〔明〕李夢陽 Li Mengyang：《空同先生集》*Kongtong xiansheng ji*，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 30 年刊本，1602 年。

- 〔明〕李攀龍 Li Panlong：《滄溟先生集》*Cangming xiansheng ji*，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萬曆甲戌徐中行刊本，1573 年。
- 〔明〕胡應麟 Hu Yinglin：《詩藪》*Shiso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79 年。
- 〔明〕祝允明 Zhu Yunming：《枝山文集》*Zhishan wenji*，新加坡國立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 13 年元和祝氏刻本，1874 年。
- 〔明〕陳子龍 Chen Zilong 著，施蟄存 Shi Zhicun、馬祖熙 Ma Zuxi 標校：《陳子龍詩集》*Chen Zilong shiji*，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 年。
- 〔明〕錢謙益 Qian Qianyi：《列朝詩集小傳》*Liechao shiji xiaozhu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83 年。
- 〔清〕王堯衢 Wang Yaoqu 著，詹福瑞 Zhan Furui、單小青 Shan Xiaoqing 點校：《唐詩合解箋注》*Tangshi hejie jianzhu*，石家莊 Shijiazhuang：河北大學出版社 Hebei daxue chubanshe，2000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明文授讀》*Mingwen shoudu*，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bianzuan weiyuanhui* 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ku quanshu cunmu congshu* 集部第 400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Qilu shushe，1997 年。
- 侯雅文 Hou Yawen：《李夢陽的詩學與和同文化思想》*Li Mengyang de shixue yu hetong wenhua sixiang*，臺北 Taipei：大安出版社 Daan chubanshe，2009 年。
- 楊遇青 Yang Yuqing：《明嘉靖時期詩文思想研究》*Ming jiajing shiqi shiwen sixiang yanjiu*，西安 Xian：三秦出版社 Sanqin chubanshe，2011 年。
- 劉坡 Liu Po：《李夢陽與明代詩壇》*Li Mengyang yu mingdai shitan*，南京 Nanjing：南京大學出版社 Nanjing daxue chubanshe，2015 年。
- 劉勇剛 Liu Yonggang：《雲間派文學研究》*Yunjianpai wenxue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8 年。
- 鄭克晟 Zheng Kecheng：《明代政爭探源》*Mingdai zhengzheng tanyuan*，天津 Tianjin：天津古籍出版社 Tianjin guji chubanshe，1988 年。
- 簡錦松 Jian Jinsong：《明代文學批評研究》*Mingdai wenxue piping yanjiu*，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9 年。

John W. Dardess, *A Ming Society: T'ai-ho County, Kiangsi, in the Four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Tian Xiaofei, *Beacon Fire and Shooting Star: The Literary Culture of the Liang (502-55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期刊與專書論文

王昌偉 Wang Changwei:〈明初南北之爭的癥結〉“Mingchu nanbei zhi zheng de zhengjie”,《明清史集刊》*Mingqingshi jikan* 第9卷,2007年9月。

崔秀霞 Cui Xiuxia:〈徐禎卿、李夢陽論辯考析〉“Xu Zhenqing, Li Mengyang lunbian kaoxi”,《時代文學》*Shidai wenxue* 總第155期,2009年5月。

張燕波 Zhang Yanbo:〈論明代金陵六朝派的發端與發展〉“Lun mingdai jinling liuchao pai de faduan yu fazhan”,《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Nan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renwen kexue, shehui kexue)* 第45卷第3期,2008年5月。

郭皓政 Guo Haozheng:〈明代政壇南北之爭與前七子的崛起〉“Mingdai zhengtan nanbei zhi zheng yu qianqizi de jueqi”,《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Wuhan daxue xuebao (renwen kexue ban)* 第64卷第3期,2011年5月。

陳綸緒 Chen Lunxu:〈記明天順成化間大臣南北之爭〉“Ji ming tianshun chenghua jian dachen nanbei zhi zheng”,收入錢穆 Qian Mu 等著:《明代政治》*Mingdai zhengzh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 1968年。

廖可斌 Liao Kebin:〈文學思潮史的寫法:以明代文學思潮史為例〉“Wenxue sichaoshi de xiefa: yi mingdai wenxue sichaoshi wei li”,《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Beijing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第53卷第5期,2016年9月。

劉海峰 Liu Haifeng:〈科舉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爭〉“Keju qucai zhong de nanbei diyu zhi zheng”,《中國歷史地理論叢》*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 總第42輯,1997年3月。

謝旻琪 Xie Minqi:〈萬曆中後期楚地文人詩學中的楚地思維〉“Wanli zhonghouqi chudi wenren shixue zhong de chudi siwei”,《東亞漢學研究》*Dongya hanxue yanjiu* 第2卷,2012年4月。

簡錦松 Jian Jinsong :〈論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之批評立場〉“Lun Qian Qianyi *Liechao shiji xiaozhuan zhi piping lichang*”, 《文學新鑰》 *Wenxue xinyao* 第 2 期, 2004 年 7 月。

Chang Kang-I Sun,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Ming to Mid-Ming (1375-1572),”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2, ed.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Fang Chaoying, “Li Tung-yang,” in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ed.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學位論文

孔健 Kong Jian :《士與國家：明代弘治、正德年間文學復古運動研究》*Shi yu guojia: mingdai hongzhi, zhengde nianjian wenxue fugu yundong yanjiu* , 香港 Hong Kong :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博士論文 Xianggang keji daxue renwen xuebu boshi lunwen , 2013 年。

簡錦松 Jian Jinsong :《李何詩論研究》*Li He shilun yanjiu* , 臺北 Taipei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 1980 年。